


裸命香港

——序郭艷媚《來生之家》



《來生之家》可謂是當代香港文學的異數。過去十年島上發生各種變化，作家有感而發，紛紛以書寫見證社會震盪。《來生之家》雖然也反映現實當下，但眼光何其不同！作者郭艷媚專注島上非法居留者的生老病死、他們卑微的願望與更大的絕望。當香港人的未來成為全世界的焦點時，郭艷媚幽幽提醒我們，還有一些（香港）人卻從未被世界看見。他們是偷渡客、非法打工者、逾期居留者、無國籍難民……——他們沒有身份。

小說中的阿辛是千萬香港女性傭工之一。她來自印尼，受過大學教育，輾轉來港後因為僱主苛待而逃離，淪為黑市居民。阿本是孟加拉偷

渡客，千方百計找尋謀生之道，卻也須隨時提防警察追捕。兩人在偶然的際遇下相識相戀，同居生了一對子女。然而因父母違法居留，孩子也沒有身份，因此被隔絕在正常醫療教育門外。

阿辛和阿布寄居貧民窟，周遭的人多來路不明，甚至連管理住處的包租公、包租婆也是半世紀或更早以前來港的偷渡者或蜑家人。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之人。郭艷媚寫這些非法居民絕處求生的掙扎、慘淡的生活、偶然迸發的歡欣片刻，細膩處有報道文學的風格。不論宿命還是意外，他們的結局無不令人歎息。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下一代何去何從。「救救孩子！」但可能麼？

郭艷媚堪稱有心之人。當代香港困境何止一處，她卻看見一般可能無暇也無從顧及的底層——不，是地下——生活，並投以有情眼光。誠如她在後記所述：「超越國籍、超越種族、超越性別，褪去宗教的神秘面紗。回到最純粹、最嚴肅的命題——其實我們只是一個人，一個有血有肉的人。」的確，島上七百萬公民的未來縱有不承受之重，那飄泊地下、身份不明者又何嘗不在同一個時空中經受煎熬？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「法外」流民？這不是濫情的人道主義書寫，而恰恰是直面嚴肅的「裸命」問題。

「裸命」一說由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（Giorgio Agamben）提出後，早成為學界流行話語。阿甘本指涉社會邊緣一種曖昧的存在體，既在法律管轄之內，又被法律視為異類予以排除，永遠處於游離的例外狀態。難民、無國籍者、集中營勞改犯都是例子。藉此，阿甘本思考現代主權權力核心所在，就是決定誰可以被降為包括在「外」的「裸命」（見 *Homo Sacer: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*）。

《來生之家》裏的偷渡客、逾期居留者、特種行業者徘徊社會邊緣內外，他們不明不白的身份坐實了合法居民一清二楚的存在。但小說似乎別有弦外之音。郭艷媚將故事設置在 COVID-19 疫情時期，一個視消殺、隔離、追蹤、檢疫為常態的非常時期。在這樣環境裏，誰又不是任人擺佈，只剩下裸命一條呢？

類似的反思早在七〇年代即已出現，美國評論者桑塔格 (Susan Sontag) 在《旁觀他人的痛苦》(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) 中，以照片 (或視覺傳媒) 所呈現的災難場景為例，質疑觀看者在同情或驚悚之餘，是否真能作出更具實效的回應。進一步而言，晚近巴特勒 (Judith Butler) 則從生命的脆弱性 (precarity) 出發，叩問面臨人間種種苦難，尤其是戰爭，是否連同情、悼亡也被區分為可見與不可見、可哀悼與不可哀悼 (見 *Frames of War: When Is Life Grievable?*)。苦難的「正義」畢竟隱含着某種分配性，甚至合法性的前提。

回到中國語境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更為生動的文學表述。魯迅曾自述，一九〇六年 在日本仙台醫校觀看了日軍斬首中國人的幻燈片，百感交集，因而棄醫從文。然而〈祝福〉裏的祥林嫂反覆自述悲慘遭遇，先是引來同情，之後卻淪為眾人的笑柄；同情與無情其實相距不遠。魯迅直指敘事倫理的弔詭性，只能以犬儒的「說不清」作為回應。

魯迅所揭示的困境，在沈從文的作品裏有了另類出路。沈筆下天地不仁的苦難——從戰爭、到社會不義到人間不幸——較之魯迅所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然而，題材雖如此殘酷，他的敘事卻如此有情，因而生出悲欣交集、物我生死同在的向度。那是慈悲的敘事學。《邊城》結尾，大難之後，翠翠依舊擺渡河水兩岸，面向未知。她等待着，「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，也許明天回來」。

郭艷媚的小說技巧或許仍有繼續打磨的必要，但在苦難敘事的挑戰上，她已展現出與傳統對話的潛力——一切都「說不清」，但無礙有情之人持續「等待」。誠如郭艷媚所說：「我希望用溫柔的筆觸，書寫無處不在的暴力。用複雜的語言，接納容許生命的沉重，重構和承擔當中的差異與多元。用心面對陽光明媚的希望，書寫暗無天日、未來難期的困境。」

《來生之家》中的人物命運每下愈況，阿布意外死亡；阿辛淪為妓女，最終命喪火場；朋友鄰居也多半結局淒慘。然而小說的敘事並不以暴露黑暗、苦大仇深為能

事。那是左派現實主義的老套。細心讀者不難發現小說不時穿插的抒情片段，如夢如真。生活再怎麼困難，小說裏的男男女女仍然保有幻想的權利，哪怕多麼微小。他們幻想有朝一日，苦盡甘來，安安穩穩地在香港定居。

小說寫盡種種窮途末路之餘，不吝援引《古蘭經》的教誨，從而點出阿辛和阿布們賴以生存的終極寄託——心中有神。這樣的安排不僅如實呈現故事人物的信仰底色，也更大膽地提醒讀者，在一個價值崩裂的時代裏，或許對精神信仰的堅守嚮往，終究勝過虛無或犬儒。如若此生已入絕境，也許有來生作為補償？

他（阿拉）是創造我，然後引導我的。他是供我食，供我飲的。我害病時，是他使我痊癒的。他將使我死，然後使我復活。

——《古蘭經》第26章

在那個重生世界裏，天空湛藍，玫瑰遍野，故事的主人翁終於在家鄉喜結連理。一

切重頭來過，生命展現善美的可能。

與其說郭艷媚嚮往彌賽亞式結局或阿Q式精神勝利法，不如說她在觀察他人之痛苦後，嘗試藉敘事周而復始的形式，想像重生的許諾。眾生皆苦，菩薩低眉。「三維之外有四維，七層天上有八層，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。每個生命的周期和維度都不同。」以極致的溫柔面對生命的暴烈，以綿延不絕的故事面對無言以對的絕境——這是香港的郭艷媚的慈悲敘事學吧。

王德威

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